

# “中等收入陷阱”存在吗？\*

## ——基于统一增长理论与转移概率矩阵的考察

郭熙保 朱兰

**内容提要:**“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主要在于已有研究缺乏理论支撑。本文首先根据绝对和相对收入标准分析历史上中等收入国家(地区)在该阶段的停留时间和经济增长率,发现中等收入国家(地区)在该阶段平均停留时间为78年且经济增长率最高,无法证明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然后运用统一增长理论证明中等收入阶段不存在稳定的均衡点,否定了中等收入陷阱稳定均衡的本质含义。最后计算139个国家的收入转移概率矩阵发现,中等收入国家的收入转移概率最高,从概率上支持了中等收入阶段更容易发生收入转移的事实,再次证明了中等收入陷阱的不存在。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统一增长理论 转移概率矩阵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进入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2015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达到7800美元,处于中高收入国家组的中等水平。但是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恶化、产业转型困难、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引起了决策层和学术界对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极大关注。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呈爆炸式增长<sup>①</sup>,我国国家领导人在一些国际场合也偶尔使用“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但在国内讲话中从未提到过这一概念,在中央文献中也从未使用这个概念。一些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进行了论证,但大多数学者只是人云亦云地接受了这一概念,然后就把中等收入国家存在的问题都归结为是中等收入陷阱的表象,把转换发展动力、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等战略方针和政策措施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范畴里讨论。但是,如此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概念究竟是什么含义?这一概念本身是否具有科学性?至今很少人从理论上对这个概念进行严肃证明和系统的论证。在这种情况下,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论证一下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问题就变得非常必要,以免在

学术界有可能把一个错误的概念当成一个科学概念加以接受。

###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在2007年发表的《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首次提出的。<sup>②</sup>《报告》援引Garrett(2004)的“中等收入国家被主导成熟产业的、低工资的穷国竞争者和主导技术迅速变化产业的、追求创新的富国挤压在了中间”,“比起较富或较穷的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会相对较慢”的研究结论(Gill et al, 2007),警示东亚中等收入国家想要继续繁荣必须经历三种转型:生产结构从多样化向专业化转变;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教育系统从培养工人技能使之适应新技术,向培养工人自己设计新产品、新工艺转变。报告直接使用“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作为标题,将拉丁美洲和中东国家作为陷入陷阱的典型例子,强调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Gill et al, 2007)。由于该报告没有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和外延做出清晰界定,之后不同学者从报告中提炼或

\* 郭熙保、朱兰,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邮政编码:430072,电子邮箱:xbguo@whu.edu.cn。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研究”(10JZD0016);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引申出不同含义。

大部分学者直接将 Garrett(2004)的研究结论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即中等收入国家由于工资上涨而无法与低收入国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相竞争,又因创新能力不足无法与处于技术前沿的高收入国家竞争,丧失了比较优势(Ohno, 2009; Yusuf & Nabeshima, 2009; Woo, 2012; Kharas & Kohli, 2011; Paus, 2012, 2014; Flaaen et al, 2013; 江时学, 2013)。Garrett(2004)和 Eeckhout & Jovanovic(2007)发现全球化时期各国经济增长率按收入排序呈 U 型分布<sup>⑤</sup>,这被认为是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率低于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证据,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提供了经验支持。

《报告》同时指出了中等收入国家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和阻力,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必须要解决城市拥堵、收入不平等、腐败等问题才能顺利实现转型。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又被一些学者延伸为一国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胡鞍钢, 2010; 王一鸣, 2011; 郑秉文, 2011; 张德荣, 2013)。导致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力资本(Rigg et al, 2014; Agénor & Canuto, 2015)、金融创新(Huang et al, 2014)、收入分配(蔡昉, 2011)、社会民主(Vandenberg, 2015)和制度演化(Aoki, 2012)等。可见,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道路上一切障碍的“代名词”。

上述两种观点都源于世界银行专题发展报告,从定性的角度进行界定。第一种观点基于比较优势理论,但比较优势理论并不能证明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首先, Garrett(2004)的研究结论建立在全球化背景下富国主导知识经济、穷国主导工资低的制造业的绝对划分上。但是经验表明,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之间的产业区分并没有那么绝对,新兴工业化国家仍然可以是成功的制造商,知识经济也并不专属于富裕国家(Gill et al, 2007),中等收入国家可以同时实施两种战略。其次,比较优势理论只看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比较劣势,而没有看到其比较优势。中等收入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虽然高于低收入国家但低于高收入国家,创新能力弱于高收入国家但强于低收入国家,依然具有比较优势。而且中等收入国家具有人力、结构、制度、技术和资本的后发优势(郭熙保, 2009),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产生比廉价劳动力更大的财富效应(樊

纲, 2014; 陶短房, 2015)。中等收入国家的比较优势并没有丧失,只是发生了转变,在国际上仍然具有竞争力。最后,华生和汲铮(2015)将 Garrett(2004)的样本时间延长到 1961—2011 年,并没有发现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率低于高收入国家或者低收入国家, Garrett(2004)的研究结论不具有一般性。

第二种观点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与低收入陷阱类似,是指一个经济体难以从一个较低收入阶段向下一个较高收入阶段跨越,“陷阱”一词只是发展经济学描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困境习惯称谓的自然延续(蔡昉, 2008; Kharas & Kohli, 2011; 杜曙光、刘刚, 2013)。但是,发展经济学只是论证了一个贫困国家如何陷入以及如何跳出低收入陷阱,却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从未证明过,反而间接论证过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率是最高的,一国经济只要跨过低收入陷阱,实现了起飞,就会进入高收入阶段。Barro(2016)依据条件收敛率,没有发现从中等收入国家收敛到高收入国家的难度比从低收入国家收敛到中等收入国家的难度大。把一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所有问题都纳入到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下讨论,遭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被认为是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扩容化”、“标签化”和“教条化”(江时学, 2013; Kharas & Kohli, 2011; 厉以宁, 2012; 徐康宁, 2012; 华生、汲铮, 2015; 范和生、唐惠敏, 2015)。

由于定性层面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不统一且存在较大争议,学者们选择从定量角度界定并证明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Felipe(2012)直接对中等收入阶段的停留时间和增长率进行了界定,认为中低收入国家在 28 年内、中高收入国家在 14 年内没有成功收敛,即陷入“中低收入陷阱”和“中高收入陷阱”。由于缺乏理论基础,这一标准的设定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Felipe et al(2014)就否定了这一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直接使用中等收入阶段转型代替中等收入陷阱。

Eichengreen et al(2011, 2014)和 Aiyar et al(2013)基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指出,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滑甚至停滞,人均收入长期无法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就被视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Eichengreen et al(2011, 2014)使用 2005 年国际购买力不变数据,测量一国人均收入达到 10000 美元后经济增速下降的转折点,发现拐点在 17000 美元处;将样本的时间跨度从 2007 年

延长至2010年,经济增速下降出现两个拐点,即在10000~11000美元和15000~16000美元,从而证明中等收入陷阱存在。Aiyar et al(2013)基于条件收敛模型,将一国人均GDP连续偏离理论预期值视为“增长陷阱”,然后比较发现中等收入国家掉入陷阱的概率最大,证明存在中等收入陷阱。Ye & Robertson(2016)从经济停滞的角度研究指出,如果一国与美国人均收入之比长期趋于平稳,且这一经济体长期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组,就说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上述定量分析基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但它并没有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下降或者停滞提供理论解释。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假设各国长期增长的基本决定因素不随时间改变,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会导致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水平趋同,收入越低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越快,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处于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之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试图用人力资本和知识外溢效应证明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最快,为世界经济出现分化提供理论依据,但并没有证明中等收入国家会出现经济停滞。而且,定量分析的结果也不具有稳健性,改变样本时间和容量,使用相同的方法也将得到不一样的结论。Pritchett & Summers(2014)将Eichengreen et al(2011,2014)的研究样本扩大到不同收入阶段的国家,数据回归结果显示,所有国家都会出现经济增长率的下降。Bulman et al(2014)考察了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率,没有发现中等收入阶段的增长率最低或者经济增速在中等收入阶段明显下降。林志帆(2014)沿用Aiyar et al(2013)的方法研究发现,相较于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陷入增长陷阱的概率最大。

综上所述,无论是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中等收入陷阱概念都存在诸多争议。理论上无法解释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经济增长理论也没有为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率最低或下降提供理论依据。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定量分析由于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被认为是一种“罗夏测试”(Rorschach test)(Eichengreen, 2014),研究结论相互矛盾,也无法证明中等收入陷阱存在。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对中等收入陷阱概念进行一个科学的界定,并对这一概念从理论和实证上进行检验,证明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

本文的贡献在于从发展经济学“陷阱”理论的均衡本质出发,对中等收入陷阱概念进行界定,并从理

论和实证上逻辑一致地论证了“中等收入陷阱”不存在。

## 二、中等收入的界定与基本事实

### (一)中等收入的界定

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前提是对中等收入的准确界定。中等收入的划分标准分为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前者是指一个固定的收入水平,后者是指经济体与参照国的收入比值。区分不同标准下的中等收入概念,对于分析该阶段的经济社会特征、判定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使用最广泛的绝对收入标准是世界银行1989年提出的人均收入(按照Atlas计算)分组法。该方法以1987年为基准年,将低于480美元的国家划为低收入国家,处于481~1940美元的为中低收入国家,处于1941~6000美元的为中高收入国家,高于6000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以后收入门槛根据通货膨胀率和汇率逐年调整。按照世界银行对214个国家和地区<sup>④</sup>(不包括缺漏值)的分组结果,本文计算了1991—2015年不同收入组国家数占国家总数的比例。结果发现,高收入国家比例从1991年的18%上升到2015年的37%,低收入国家所占比例从30%下降至14.5%,中高收入国家比例小幅上升,中低收入国家比例小幅下降。2005年之后,高收入国家成为世界上所占比例最多的收入组。

Felipe et al(2014)使用Maddison(2010)1990年国际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数据,根据2000美元、7250美元和11750美元将各国分为低、中低、中高和高收入国家,统计1950—2013年不同收入组的国家数发现,高收入国家数目从1950年的3个增加到2013年的33个,低收入国家从80个减少到40个,世界各国收入分布呈现出高收入国家不断增加、低收入国家不断减少的趋势。按照这个趋势,只要一个经济体保持正的经济增长率,迟早会从低收入阶段迈向中等收入阶段,并最终成为高收入国家(Badiee, 2012)。几百年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将会消失,中等收入概念将成为一个历史概念,也就不存在中等收入阶段难以跨越的情况。

由于绝对标准存在弊端,许多学者提出了相对标准的中等收入概念。Woo(2011)提出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将一国或地区的收入水平占美国收入水平百分比的20%、55%作为划分低、

中、高收入组的标准。Kremer et al(2001)和 Im & Rosenblatt(2013)将收入组别进一步细分,前者将经济体与美国的收入百分比的 1/16、1/8、1/4、1/2 作为低、中低、中中、中高和高收入组的分界值,后者将这一分界值定为 15%、30%、45% 和 60%。

美国由于 1920 年后长期处于世界经济前沿且长期保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被当作衡量其他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参照国。表 1 列出了 1990—2015 年 187 个国家(地区)<sup>⑤</sup> 基于 Kremer et

al(2001)和 Im & Rosenblatt(2013)两种不同标准的分组结果。数据表明,不同标准下的国家收入分布显著不同,但各收入组国家的数量基本保持不变。按照 Im & Rosenblatt(2013)的分组标准,世界收入分布很不均衡,呈现“脚重腰细头轻”型。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最多,占了近 70%;高收入国家次之,中中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最少。按照 Kremer et al(2001)分组,整个世界收入分组呈现“直筒型”,分布比较均衡,各个收入组的国家数目总体上维持在 30~60 个之间,差距不大。

表 1 1990—2015 年不同收入国家所占比例(相对标准)

Im & Rosenblatt(2013)收入分组标准						
年份	国家总数(个)	L:[0,0.15]	LM:[0.15,0.3]	MM:[0.3,0.45]	UM:[0.45,0.6]	H:[0.6,1]
1990	187	0.53	0.20	0.06	0.04	0.16
2000	187	0.49	0.21	0.09	0.05	0.17
2010	187	0.41	0.21	0.14	0.05	0.19
2015	187	0.42	0.24	0.09	0.09	0.17
Kremer et al(2001)收入分组标准						
年份	国家总数(个)	L:[0,1/16]	LM:[1/16,1/8]	MM:[1/8,1/4]	UM:[1/4,1/2]	H:[1/2,1]
1990	187	0.33	0.16	0.18	0.13	0.20
2000	187	0.29	0.16	0.21	0.15	0.20
2010	187	0.24	0.13	0.20	0.21	0.22
2015	187	0.29	0.10	0.20	0.20	0.21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http://blogs.worldbank.org/opendata/new-country-classifications-2016>),通过整理而得,表中仅列出部分年份数据。L、LM、MM、UM 和 H 分别代表低、中低、中中、中高和高收入组,区间数值是收入分组的界限值,与参照国的人均 GDP 比值处于这一区间内的经济体即属于该收入分组。

不论如何,相对标准下世界各国的收入分布没有呈现单向变化趋势,各收入组的国家数基本保持不变。因此,按照相对标准计算,只要世界经济体之间的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存在差距,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追赶高收入国家的脚步就不会停止,中等收入国家将一直存在。

## (二)中等收入阶段的停留时间和经济增长率

中等收入陷阱描述的是“比起较富或较穷的国家来说,中等收入国家的成长会相对较慢”,或者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长期无法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经济现象,因此,较长的停留时间和较低的经济增长率成为界定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指标。了解历史上中等收入阶段的停留时间和经济增长率,概括中等收入阶段的一般性特征,有助于加深对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理解。

1. 中等收入阶段的停留时间。一国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停留时间是判定其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

阱的直接标准。Felipe(2012)对停留时间做了清晰的界定,在中低收入阶段停留时间超过 28 年和在中高收入阶段停留时间超过 14 年的国家(地区)都被认为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在不到 30 年时间成功从中等收入阶段跨越到高收入阶段,被当作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范。而拉美国家自 20 世纪 80 年代达到中等收入门槛,在长达 50 年左右的时间内始终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被视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

但是,比较历史上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的中等收入阶段停留时间,我们发现拉美国家并不是唯一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表 2 列出了 Felipe et al(2014)按照绝对标准计算的高收入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历史停留时间。显然,这些经济体都曾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中等收入阶段。最早进入中低收入阶段的荷兰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了 143

年,英国、比利时、乌拉圭等国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时间超过100年,除了中国台湾地区,其他国家(地区)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都超过30年。据 Felipe et

al(2014)统计,截至2013年,高收入经济体在中低收入阶段的平均停留时间为58年,在中高收入阶段的平均停留时间是16年。

表2 高收入国家(地区)的中等收入阶段停留时间

单位:年

国家(地区)	荷兰	乌拉圭	英国	澳大利亚	比利时	智利	新西兰	奥地利	德国
停留时间	143	142	128	119	119	114	103	100	99
国家(地区)	法国	丹麦	美国	瑞士	加拿大	瑞典	西班牙	意大利	挪威
停留时间	97	96	93	91	88	72	75	72	68
国家(地区)	芬兰	爱尔兰	希腊	毛里求斯	葡萄牙	日本	以色列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停留时间	57	62	55	53	49	44	36	33	26

资料来源: Felipe et al(2014)的表3和表6,经过整理而得。

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也比较了相对标准下各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停留时间。图1和图2分别列出了1800—2010年部分欧美国家和拉美国家的人均GDP与美国人均GDP比值的变化趋势。按照Woo(2011)的追赶指数,1800年世界各国已经存在高、中、低收入之分。其中,发达国家在下列时间段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芬兰1850—1960年,意大利1880—1970年,挪威1880—1920年,瑞典1860—1920年,爱尔兰1930—1990年(1880—1920年间数据缺失,不纳入计算),希腊1870—2010年,葡萄牙1850—2010年,西班牙1870—2000年。据估算,相对标准下发达国家经历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也较长,从60年到160年不等,与绝对标准下的研究结果一致。

因此,不论按照哪种收入标准计算,发达国家都曾经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了较长时间,平均停留时间达到78年,拉美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50~60年并不是一个特殊现象。而且与世界各国在低收入阶段停留的上千年时间相比,一国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50~60年时间算不上“长期”,更算不上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停滞”或陷阱,而是可以一跃而过的瞬间(华生、汲铮,2015)。因此,如果把当今中等收入国家10年、20年甚至50年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的事实当作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表征是非常武断的结论。

同时,比较拉美国家与美国人均GDP之比,我们发现拉美国家与美国拉开差距并不是在1970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而是在20世纪初。大部分国家在20年代初期,相对收入趋于下降。比如,巴西和哥伦比亚1900年从中等收入国家落入低收入国家,乌拉圭在1910年从高收入国家变为中等收入国家,阿根廷在1940年从高收入国家变为中等收入

国家。但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尽管拉美国家一直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但其与美国人均GDP差距有所缩小,说明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停滞。

2. 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增长率。发展经济学理论论证了一国在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率最高,与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背道而驰。工业化过程是指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部门的相对地位逐渐下降,服务业部门相对上升,工业部门的比重大幅度提高。由于工业部门具有更大的规模经济效应,更精细的分工合作,更高的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含量,更强的前向、后向联系效应,工业部门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发展速度远远大于农业和服务业。一国从起飞阶段向成熟阶段转变正是一国工业化快速扩张的时期,也是该国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阶段。因此,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增长率应该是最高的,而不是最低的。Echevarria(1997)、陈晓光和龚六堂(2005)回归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增长率和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均发现人均GDP增长率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驼峰型趋势。

Garrett(2004)使用世界银行人均GDP(按199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数据,将人均收入前25%、中间45%、底部30%的国家分别划分为高、中、低收入国家。作者比较不同收入组人均GDP增长率发现,高收入国家2000年的人均GDP相较于1980年提高了50%,同期低收入国家提高了150%,而中等收入国家仅提高了20%,提出了“相较于富国和穷国而言,中等收入国家增长较慢”的结论。这一观点成为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重要依据,并成为证明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关键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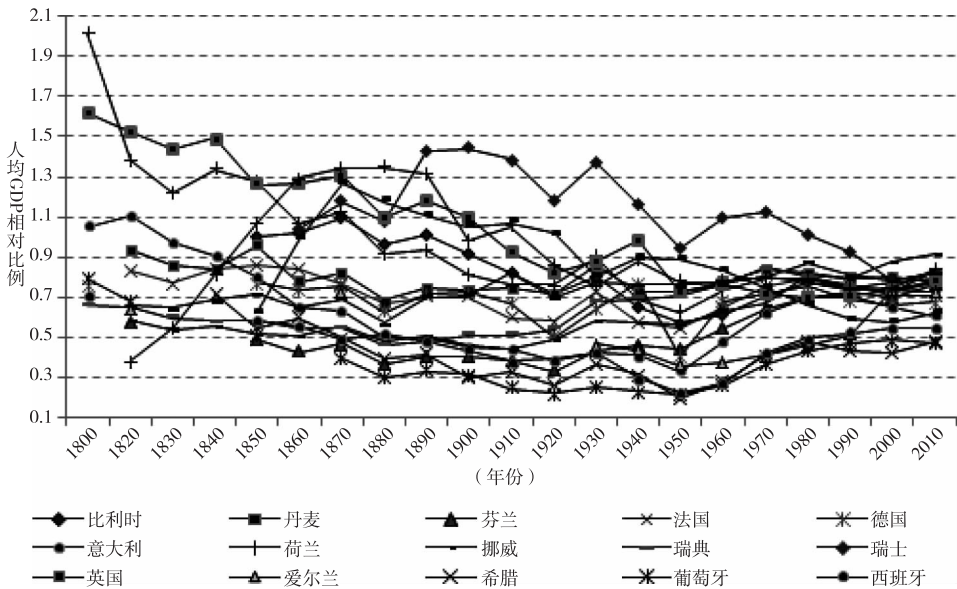


图1 1800—2010年欧洲各国人均GDP与美国人均GDP比值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Maddison(2013), The Maddison-Project, <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 2013 vers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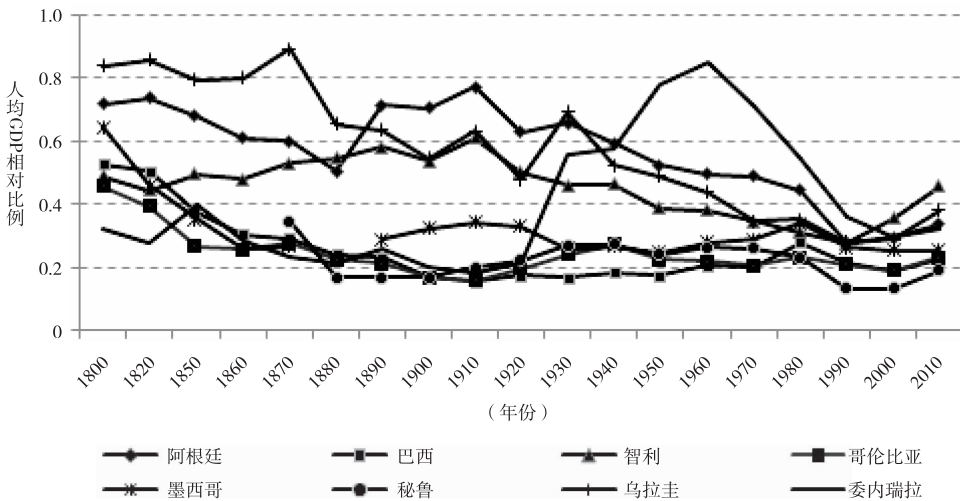


图2 1800—2010年拉丁美洲主要国家与美国人均GDP比值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Maddison(2013), The Maddison-Project, <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 2013 version.

但是, Garrett(2004)的研究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 延长样本的时间, 或者扩大样本的范围, 是否依旧可以得出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相对较慢的结论? 我们同样使用世界银行的人均GDP增长率数据, 将不同收入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发现, 2000年以前, 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总体上确实低于高收入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 但并没有低于低收入国家。1998年之后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加

速, 2000年之后, 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超过高收入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 成为经济增长率最高的经济体。如果将 Garrett(2004)的样本时段延长至1980—2015年, 我们发现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平均增长率是2.7%, 高于高收入国家的1.7%和低收入国家的0.7%, 比世界平均增长率1.39%高出1.3个百分点, 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整体经济增长率最高, 这从图3中可以明显看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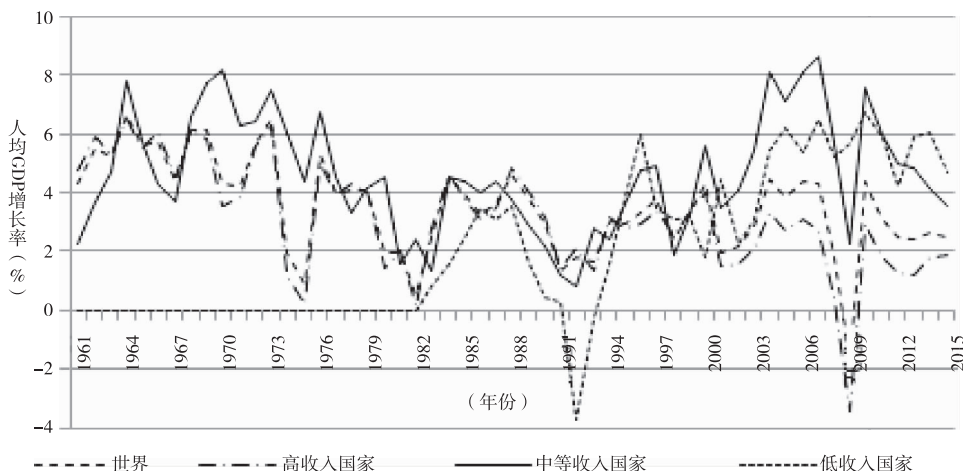


图3 低、中、高收入经济体和世界人均GDP增长率对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http://databank.shihang.org/data>)。

进一步,我们比较几个经常被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差异,比如拉丁美洲的墨西哥、智利、秘鲁、巴西、乌拉圭,以及亚洲的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比较发现,1980—2000年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确实明显低于高收入国家(但也有例外,智利、马来西亚和泰国增长率就比较高),1980—2015年秘鲁、巴西、墨西哥和菲律宾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也低于高收入国家。但如果不考虑20世纪80年代的特殊时期,比较1990—2015年的人均GDP(按照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增长率,中等收入国家并不低于高收入国家。发达国家的人

人均GDP增长率分别是:美国1.41%,英国1.5%,法国0.95%,德国1.35%,瑞典1.54%,澳大利亚1.71%,比利时1.22%,荷兰1.46%,日本0.77%,集中在0.77%~1.71%之间。除了墨西哥1.39%和巴西1.1%低于一些高收入国家,其他中等收入国家都获得高于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如智利3.56%,秘鲁3.23%,乌拉圭2.87%,泰国3.4%,马来西亚3.6%,菲律宾2.21%。如果按照2011年不变价国际元计算的人均GDP增长率来看,除了澳大利亚的3.07%略高于墨西哥和巴西的2.71%,其他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均低于中等收入国家。

表3 1980—2015年世界各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

国家	人均GDP(按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1980—2015年			人均GDP(按2011年不变价国际元计算)1990—2015年	
	1980—2000年	1980—2015年	1990—2015年	1990—2015年	1990—2000年
美国	2.27%	1.68%	1.41%	2.44%	3.44%
英国	2.45%	1.86%	1.50%	2.03%	2.43%
法国	1.80%	1.23%	0.95%	1.49%	2.09%
德国	1.90%	1.59%	1.35%	1.45%	1.98%
瑞典	1.83%	1.64%	1.54%	2.09%	2.13%
荷兰	1.99%	1.52%	1.46%	1.96%	3.31%
澳大利亚	2.16%	1.75%	1.71%	3.07%	3.31%
比利时	1.93%	1.41%	1.22%	1.72%	2.24%
日本	2.44%	1.70%	0.77%	0.88%	1.13%
秘鲁	-0.59%	1.34%	3.23%	4.74%	3.91%
智利	3.51%	3.15%	3.56%	4.86%	6.40%
巴西	0.29%	0.87%	1.39%	2.71%	2.58%
墨西哥	0.69%	0.69%	1.10%	2.71%	3.58%
乌拉圭	1.01%	1.84%	2.87%	3.27%	3.40%
马来西亚	3.77%	3.46%	3.60%	5.74%	7.11%
泰国	4.63%	4.12%	3.40%	4.16%	4.39%
菲律宾	-0.24%	1.28%	2.21%	4.22%	2.86%

资料来源:人均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bank.shihang.org/data>),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使用公式 $(\frac{1}{n} \frac{pgdp_n}{pgdp_0} - 1)$ 计算得到。



因此,拉丁美洲国家 20 世纪 80 年代的债务危机是 1980—2000 年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率最低的主要原因,如果不考虑拉美国家“失去的十年”,这一结论就不成立。而且,按照更具有跨国可比性的 PPP 计算的人均 GDP,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高收入国家。因而,Garrett(2004)的研究结论存在局限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个普遍规律,不应该被广泛使用在所有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表现上。

### 三、统一增长理论与中等收入阶段

均衡陷阱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使用是有悠久历史的,也是有特定的逻辑含义的(蔡昉,2011)。它是指一种稳定的均衡状态,没有巨大外力的作用是无法改变的。发展经济学中“陷阱”与“稳定均衡”同义,最著名的“陷阱”便是“贫困陷阱”。很多理论都对贫困陷阱进行了理论论证,比如“贫困恶性循环论”、“低水平均衡陷阱论”、“循环累积因果论”、“马尔萨斯人口论”、“大推进论”等,贫困陷阱理论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因此,基于发展经济学的传统,我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增长存在一个稳定的均衡点,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如果不做出极大努力就难以向高收入阶段发生转移。

诞生于 21 世纪初的统一增长理论尝试将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状态或阶段统一在同一个模型中,解释一国经济是如何内生地从马尔萨斯阶段起飞并进入持续经济增长阶段。区别于马尔萨斯理论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统一增长理论一直致力于构建一个多重均衡的框架,即长期经济增长从一个低收入水平的稳态逐渐向一个高收入水平的稳态过渡。从数学模型的角度来看,统一增长理论的基础是一个参数化的动力系统,对应于不同的参数值,相应的动力系统的奇点(稳态)可以是稳定的,也可以是不稳定的(杨斌,2011)。中等收入阶段作为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向高收入转型的过渡阶段,理应包含在统一增长理论框架下。中等收入阶段对应的奇点是否是一个稳定均衡点,决定了“中等收入陷阱”是否符合“陷阱”的经济学解释。

#### (一)统一增长理论的基本模型与演化机制

Galor & Weil(2000)构建了最早也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统一增长理论模型。统一增长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引入微观家庭的生育决策,考虑家庭理性选择生育率时后代数量和质量的替代关系,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内生化的,从而解释超长期下经济如何从马

尔萨斯时期向持续增长时期转变。理论主要基于四大基石:马尔萨斯要素、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的形成以及家庭生育率理性决策机制。其中马尔萨斯要素包含马尔萨斯陷阱的形成机制,即个人存在生存约束时,人均收入的提高会提高生育率,人口数量增加稀释经济增长的效应。技术进步则依赖于人口规模(人口规模扩大通过产生创新思想、增加对新技术的需求、提高技术扩散速率、劳动分工和国际贸易途径促进技术进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的产生源于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当期的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率负相关,与教育水平正相关。家庭生育率的理性决策依赖于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的需求程度,在人力资本需求很弱时偏向于子女的数量而轻视质量,在人力资本需求较强时偏向于子女的质量而减少子女的数量。后代数量和质量之间具有替代关系。

根据人口生育决策导致的人口与收入的动态演化关系,统一增长理论将一国长期经济增长过程分为马尔萨斯阶段、后马尔萨斯阶段和持续增长阶段。在马尔萨斯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低,个体生育决策倾向于后代数量,人口出生率高,收入提高与人口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收入的提高被增加的人口稀释,经济增长缓慢,处于马尔萨斯陷阱状态中。持续增长阶段的家庭生育率决策明显偏向人口质量,人口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二者形成良性循环,人均收入以一个稳定的速度增长。马尔萨斯阶段和持续增长阶段都对应着一个稳定的均衡点(如图 4 左图中 $(0, g^l(L))$ 、 $(e^h, g^h)$ 所示,其中横轴  $e$  表示教育水平,纵轴  $g$  表示技术进步)。

后马尔萨斯阶段是一个过渡阶段,该阶段的经济有所增长,人口数量增加,技术进步率提高。技术进步的提高一方面放松生存约束,使家庭有能力抚养更多子女,增加人口数量,另一方面多生产的资源可以用于提高子女质量。此时如果技术进步缓慢,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很弱,家庭生育决策偏向于子女的数量,人口增长率就会高于经济增长率,收入被稀释,经济将再次回到马尔萨斯阶段。但是,如果技术进步加快,对人力资本需求扩大,引诱家庭的人口决策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此时人口增长率就会低于经济增长率,经济体就会越过后马尔萨斯临界点,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推动经济向持续增长阶段前进,直到达到高水平均衡状态。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对应着一个不稳定的均衡点,即图 4 中的 $(e^u(L), g^u(L))$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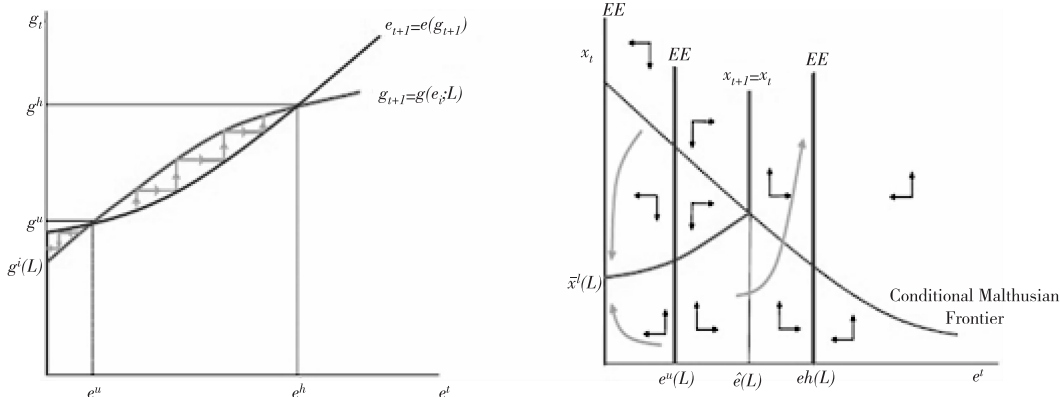


图4 中等人口规模条件下的教育、技术和人均有效资源的演化相位图

资料来源:Galor(2005)。

表4列出了马尔萨斯阶段、后马尔萨斯阶段和持续增长阶段的人口经济特征。其中,马尔萨斯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较高,预期寿命较短,人口增长缓慢。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数量和物质资源推动。后马尔萨斯阶段人口出生率依旧较高,但

死亡率下降,预期寿命延长,人口规模逐渐扩大。后马尔萨斯阶段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技术水平提高,人力资本初步形成,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持续增长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人口扩张速度减慢。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人均收入以一个恒定速率持续增加。

表4 统一增长理论三个阶段的人口经济特征

阶段	人口			经济			
	出生率	死亡率	预期寿命	人口增长	人力资本	技术进步	经济增长
马尔萨斯	高	高	短	缓慢	很小	很小	缓慢
后马尔萨斯	高	低	延长	加快	出现	较快	较快
持续增长	低	低	较长	下降	加快	加快	加快

资料来源:根据 Galor(2005)对经济增长三阶段的描述,概括而得。

马尔萨斯阶段和后马尔萨斯阶段的共同特征在于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之间依然存在正相关关系,人口数量和物质资本对经济的贡献占主导作用,但后者人口规模更大,技术进步加快,人力资本开始出现,人口增长对资源的稀释作用下降,人均产出增长较快。后马尔萨斯阶段和持续增长阶段的区别主要在于人口转型。技术进步加速提高了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家庭生育决策从“重量轻质”转变为“重质轻量”,人口转型出现,人力资本对经济产出的贡献率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加快。

## (二)后马尔萨斯阶段与中等收入阶段基本特征比较

这部分将实证检验中等收入阶段的基本特征与统一增长理论描述的后马尔萨斯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否吻合。如果两者吻合,就可以把统一增长理论描述的后马尔萨斯阶段的均衡状态看作是中等收入阶

段的均衡状态。本文将从各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人口结构、人口转型以及经济增长动力四个方面分析中等收入阶段人口经济特征。

1. 进入时间比较。Felipe et al(2014)根据人均GDP将历史上各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进行了统计,荷兰最早于1827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英国、比利时、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等国在1850年左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爱尔兰、西班牙、日本、委内瑞拉、墨西哥等国在1920年左右进入,也门、中国、泰国、印度尼西亚、突尼斯等国在20世纪末期才进入。Galor(2005)描述各国进入后马尔萨斯的时间大致为,发达国家大约在19世纪初期进入后马尔萨斯阶段,欠发达国家在19世纪末期,部分国家延迟至20世纪中后期进入。比较分析发现,Felipe et al(2014)与Galor(2005)描述的世界各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和进入后马尔萨斯阶段的时间基本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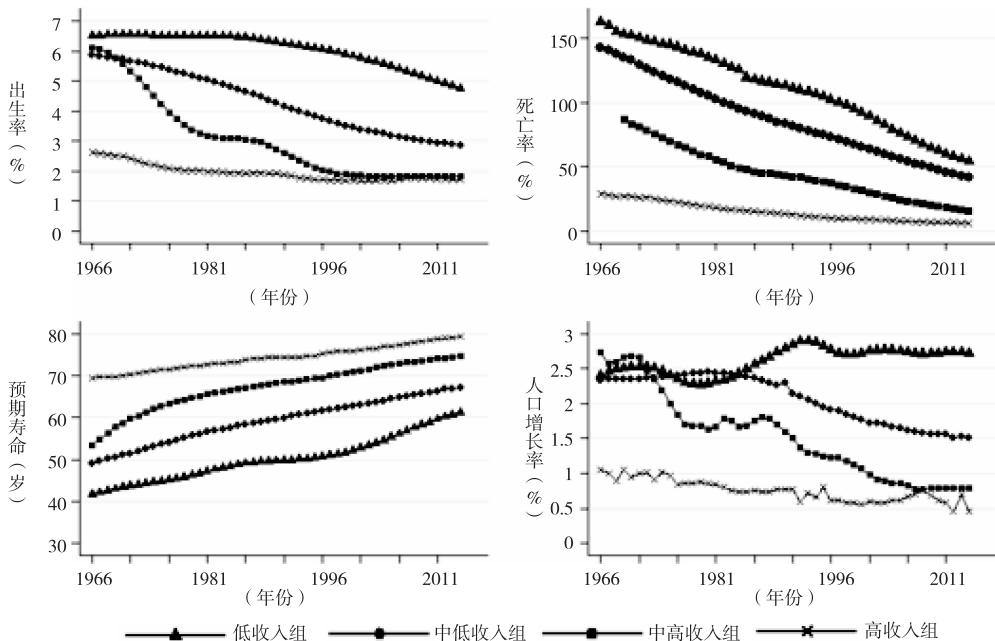


图5 1966—2015年不同收入组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预期寿命和增长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http://databank.shihang.org/da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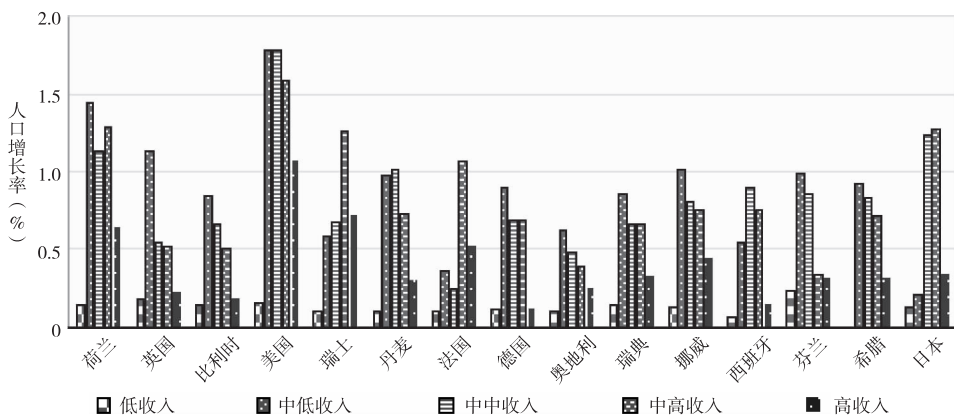


图6 1—2013年完整跨越不同收入阶段经济体的人口增长率

注：本文根据Galor(2005)的研究思路将1820年作为低收入阶段和中等收入阶段的分界点，并借鉴Felipe(2012)的研究思路进一步将中等收入阶段细分为中低、中中和中高三个阶段。人口增长率数据来源自Total Economy Database(<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data/economydatabase/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

2. 人口转型比较。人口出生率、死亡率、预期寿命、人口增长率以及人均收入是区分统一增长理论三阶段的重要指标。为便于比较，图5刻画了不同收入国家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预期寿命和人口增长率。从图中可以看出，低收入国家人口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较短的预期寿命，人口增长率高但变化不大，与马尔萨斯时期的人口特征相似；高收入国家人口具有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较长的预期寿命，人口增长率始终保持较低的水平，与持续增长时期的人口特征相似；中等收入国家则与后马尔

萨斯时期的人口特征相似，出生率和死亡率有所下降，但依旧较高，预期寿命延长。按照人口转型的界定标准(Chesnaï, 1992)<sup>⑥</sup>，中高收入阶段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出现了明显的人口转型。

我们还可以从更长的时期考察一下高收入国家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人口转型情况。图6列出了15个完整跨越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的人口增长率变化趋势。时间跨度从公元元年到2013年。很明显，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率都经历了一个“倒U”型曲线。<sup>⑦</sup>一国在低收入阶段人口增长率最

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人口增长率显著上升,但在中高收入阶段人口增长率有所下降,高收入阶段的人口增长率显著低于中高收入阶段。从而可知,一国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过渡时出现了人口转型。

这种关系也可以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收入和收入二次项的计量模型表示:

$$\Delta \ln n_{t,i} = \beta_0 + \beta_1 \ln y_{t,i} + \beta_2 (\ln y_{t,i})^2 + \pi_i + \zeta_t + \nu_{t,i} \quad (1)$$

其中  $n_{t,i}$  表示  $i$  国  $t$  期的人口数量,  $y_{t,i}$  由  $i$  国  $t$  期的人均 GDP 表示,所有变量均取对数形式以消除极端值影响,  $\Delta \ln n_{t,i}$  表示  $t$  期  $i$  国的人口增长率,  $\pi_i$ ,  $\zeta_t$  表示国家和时间固定效应,  $\nu_{t,i}$  表示随机误差项,假设其服从标准正态分布。本文预期  $\beta_1$  的系数为正,  $\beta_2$  的系数为负,说明在收入较低时,收入增加会导致人口增长率加快,但收入到达某一点后,收入增加导致人口增长率下降,人口结构出现转型。表 5 列出了基于不同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 U”型关系,且比较显著。

表 5 人口增长率与收入增长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1)	(2)
对数人均 GDP	0.119*** (0.021)	0.019*** (0.003)
对数人均 GDP 平方项	-0.007*** (0.001)	-0.001*** (0.000)
国家和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940	3174
$R^2$	0.479	0.511

注:方程 1 以公元 1—2008 年丹麦、法国、荷兰、澳大利亚和瑞典 5 国的人口和人均 GDP 数据为样本,方程 2 以 1870—2008 年 23 个国家的人口和人均 GDP 数据为样本。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表示 1% 的显著水平。

3. 经济增长比较。统一增长理论刻画了人口增长、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共同演化的动态机制。马尔萨斯时期,人力资本几乎为零,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后马尔萨斯时期人力资本开始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稀释作用;随着工业化和技术进步的加快,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增加,家庭生育决策的改变导致人口转型,进

一步促进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的良性循环,经济向持续增长阶段演进。Vries & Erumban(2015)根据经济增长模型计算出 128 个国家 1990—2014 年劳动力数量、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ICT 资本(高技术资本)和非 ICT 资本(低技术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其中要素增长的贡献率等于要素产出弹性与要素增长率的乘积<sup>⑧</sup>,所有要素贡献率之和等于 GDP 增长率。本文按照 1990 年的人均 GDP 将所有国家分组<sup>⑨</sup>,在绝对贡献率的基础上计算相对贡献率(即要素增长贡献率与 GDP 增长率的比值),可以得出不同收入国家组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见表 6)。

从表 6 中看到,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数量和低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对增长的贡献率很小,仅为 3%,可以忽略不计。低收入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为负,而且绝对值高达 33%,表明低收入国家技术进步非常缓慢。中等收入国家人力资本和高技术资本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提高了 3% 和 4%,但人口增长和低技术资本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依然占据主导地位。高收入国家的人力资本贡献率达到 20%,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31%,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由于高收入国家面临人口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高技术资本增长对经济产出的贡献率有所提升,但低技术资本的贡献率依旧较高。这些实证结果表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特征与后马尔萨斯阶段相似,而低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则与马尔萨斯阶段和持续增长阶段比较一致。

综上所述,不论是中等收入阶段的进入时间,还是中等收入阶段的人口与经济特征,都与后马尔萨斯阶段基本吻合。因此,我们把中等收入阶段大致上看成是后马尔萨斯阶段,根据统一增长模型所描述的后马尔萨斯阶段的非稳定均衡点,我们断定中等收入阶段不存在稳定的均衡点。从经济学对陷阱的传统定义来说,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陷阱”,从而从理论上证明了中等收入陷阱是不存在的。

表 6 1990—2014 年不同收入国家组要素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

收入分组	不同要素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					观测值个数
	人力资本	劳动力数量	ICT 资本	非 ICT 资本	TFP	
低收入国家组	3	59	10	60	-33	525
中等收入国家组	6	66	14	43	-27	1099
高收入国家组	20	-18	17	51	31	575

数据来源:TED(<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data/economydatabase>, May 2015),表中数据经整理而得。

#### 四、收入转移概率矩阵与中等收入阶段停留时间

以上我们从理论上证明了中等收入陷阱不存在稳定的均衡点。本节使用 1950—2008 年 139 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计算不同收入组的转移次数和转移概率,检验中等收入阶段的稳定性,即一个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的转移概率是否小于低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如果中等收入阶段的转移概率远远小于低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的转移概率,说明中等收入阶段相对于其他发展阶段稳定,中等收入陷阱存在,反之则不成立。

##### (一) 中等收入阶段的转移次数

本文借鉴 Kremer et al(2001)的收入分组方法,按照占美国人均 GDP 的 1/16、1/8、1/4、1/2,将每个国家的收入状态分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中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然后分别计算 1950—2008 年各个收入组国家向上转移和向下转移的次数,并按照转移次数为零、1~3 之间和大于 3 将各国定义为未发生转移、转移次数较少以及转移频繁三类。最后,根据 1950 年的收入水平将 139 个国家分组,统计每个收入组发生收入转移的国家数(见表 7)。

从上述不同收入组发生转移的国家数可以看出,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比中等收入国家更稳定。在未发生收入转移的国家中有 13 个高收入国家,4 个中等收入国家,11 个低收入国家,占比分别是 76.5%(13/17)、4%(4/98)和 45.8%(11/24),这意味着 96%的中等收入国家发生了收入转移。且发生收入转移的中等收入国家中,中中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向上转移的更多,中低收入国家向下转移的更多。很明显,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更为稳定,而中等收入国家更容易发生转移,这也说明中等

收入国家的分化更为显著,一部分倒回到低收入国家组,一部分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即出现了双峰型(twin-peak)格局。

但是,根据 1950 年的人均 GDP 之比确定的各经济体的收入组别,忽略了经济体收入动态调整的事实,研究结果不具有稳健性。因此,为克服静态分组的缺陷,下文基于马尔科夫链转移概率矩阵动态分析不同收入国家的转移概率,客观地评价不同收入阶段的稳定性。

##### (二) 中等收入阶段的转移概率

马尔可夫链是 1906 年马尔可夫(A. A. Markov)提出的一个离散时间随机过程。该过程满足两个条件:(1)t+1 期系统状态的概率分布只与 t 期的状态有关,与 t 期以前的状态无关;(2)从 t 期到 t+1 期的状态转移与 t 期的值无关。假设一国相对人均收入服从不随时间变化的转移概率的一阶马尔科夫链,一国从 i 状态向 j 状态转移的概率记为  $p_{ij}$ 。t 期状态等于 j 的概率只取决于 t-1 期的状态 i,即

$$\begin{aligned} \Pr(s_t = j \mid s_{t-1} = i, s_{t-2} = k, \dots) \\ = \Pr(s_t = j \mid s_{t-1} = i) = p_{ij} \end{aligned} \quad (2)$$

然后计算转移概率矩阵:

$$P = \begin{pmatrix} p_{11} & p_{12} & \dots & p_{1N} \\ p_{21} & p_{22} & \vdots & p_{2N} \\ \vdots & \dots & \ddots & \vdots \\ p_{N1} & p_{N2} & \dots & p_{NN} \end{pmatrix} \quad (3)$$

$p_{ij}$  表示从状态 i 转移为状态 j 的概率,  $p_{ii}$  表示保持在原有状态的概率。运用 Matlab 编程,可以得到 1950—2008 年不同国家的收入分组情况,同时本文增加不同时间跨度的纵向比较,以消除不同跨期内收入阶段跨越的难度差异,增加研究结果的稳健性。<sup>⑩</sup>

表 7 1950—2008 年不同收入组发生转移的国家数

(单位:个)

阶段		未发生转移 国家数	转移次数小于 3			转移次数大于 3		
国家数			向上转移的 国家数	停留的国家数	向下转移的 国家数	向上转移的 国家数	停留的国家数	向下转移的 国家数
低收入	24	11	4	1	0	3	5	0
中低收入	42	1	2	4	15	4	7	9
中中收入	39	3	11	6	4	6	4	5
中高收入	17	0	7	3	1	0	3	3
高收入	17	13	0	0	3	0	0	1
国家总数	139	28	24	14	23	13	19	18

数据来源: Maddison(2013), 经过计算整理而得。

表8 1950—2008年不同收入组国家的转移概率矩阵

时长	类型	n	L:[0,1/16)	LM:[1/16,1/8)	MM:[1/8,1/4)	UM:[1/4,1/2)	H:[1/2,+8)
5年	L:[0,1/16)	1993	0.943	0.056	0	0	0
	LM:[1/16,1/8)	1565	0.123	0.781	0.094	0.002	0
	MM:[1/8,1/4)	1611	0.002	0.098	0.782	0.118	0
	UM:[1/4,1/2)	1123	0	0	0.115	0.799	0.086
	H:[1/2,+8)	1160	0	0	0	0.044	0.956
10年	L:[0,1/16)	1755	0.913	0.087	0	0	0
	LM:[1/16,1/8)	1450	0.229	0.630	0.130	0.008	0.002
	MM:[1/8,1/4)	1478	0.007	0.148	0.683	0.159	0.004
	UM:[1/4,1/2)	1034	0.002	0.005	0.166	0.691	0.136
	H:[1/2,+8)	1045	0	0	0	0.075	0.924
14年	L:[0,1/16)	1555	0.902	0.098	0	0	0
	LM:[1/16,1/8)	1373	0.305	0.526	0.154	0.008	0.007
	MM:[1/8,1/4)	1370	0.013	0.179	0.625	0.18	0.003
	UM:[1/4,1/2)	959	0.006	0.009	0.188	0.620	0.176
	H:[1/2,+8)	953	0	0	0.006	0.098	0.896
28年	L:[0,1/16)	925	0.848	0.130	0.023	0	0
	LM:[1/16,1/8)	1077	0.517	0.286	0.139	0.052	0.006
	MM:[1/8,1/4)	971	0.059	0.229	0.512	0.145	0.055
	UM:[1/4,1/2)	664	0.009	0.029	0.273	0.464	0.226
	H:[1/2,+8)	641	0	0.009	0.006	0.192	0.793

注:L、LM、MM、UM和H分别表示低、中低、中中、中高和高收入组,表格中数据表示该收入组在跨期内转移到其他收入组的概率,每行概率和为1。

首先,从概率矩阵对角线上的元素大于对角线两边的元素可知,同一时长下各收入组国家停留在本收入组的概率大于向其他收入组转移的概率。一个经济体在T年属于第i组,5年后仍属于第i组的概率区间为[78.1%,95.6%],10年后仍属于第i组的概率区间为[63%,92.4%],14年后仍属于第i组的概率区间为[53%,90%],28年后仍属于第i组的概率区间为[29%,85%]。相反,随着跨期从5年延长到28年,低收入组向上转移的概率从5.6%增加至13%,中低收入组、中中收入组和中高收入组向上转移的概率分别从9%、12%和8.6%增加至14%、15%和22.6%。中等收入组平均停留的概率从78%下降至41.7%。这说明,一个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发生转变,需要较长时间的累积,短时间的经济波动或停滞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短期的增长率下降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也不意味着一国经济体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其次,同一时长下,收入转移多发生在相邻状态之间,很少发生跨越式的转移。5至14年内,低收

入国家只可能向上转移为中低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只可能向下转移为中高收入国家;28年后,低收入国家成为中中收入国家的概率也仅为2.3%,高收入国家向下转移为中中、中低收入国家的概率为0.6%和0.9%,可以忽略不计。不论5年、10年的短周期,还是14年、28年的中长周期,一国收入向上转移的概率主要集中在邻近状态,跨越发展的概率最高不超过3%。这说明,低收入国家或者中低收入国家直接跨越成为高收入国家是不可能的,中等收入阶段是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最后,不同时长下,中等收入组国家的转移概率始终大于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国家的转移概率。跨期时长为5年时,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停留在本收入组的概率约为95%,转移概率仅为5%,而中等收入国家(包括中低、中中和中高收入组)的停留概率约为78%,转移概率达到22%,转型概率相差17%。跨期时长为10年时,高、低收入组的转移概率约为8%,中等收入组的平均转移概率为

33.3%，相差25.3%。跨期时长为14年时，高、低收入组和中等收入组的平均转移概率数值分别变为10%和41.3%，差距达到31.3%。跨期时长为28年时，高、低收入组的转移概率达到20%，而中等收入组的转移概率高达58.3%，差距进一步扩大到38.3%。不论跨期时长为多久，中等收入国家的转移概率始终大于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且随着时间的延长，中等收入国家的转移概率与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收入转移概率的差距逐渐加大。

而且，比较同一时长内不同收入阶段向上转移的概率，并没有出现“后一跨越更难，且导致经济停滞其间”的现象(蔡昉,2011)。在5年跨期时长下，低收入国家向上转移为中低收入国家的概率为5.6%，中低、中中、中高收入组向上转移的概率分别是9.4%、11.8%和8.6%。10年跨期时，低收入国家向上转移的概率为8.7%，中低、中中、中高收入组向上转移的概率分别为13%、15.9%和13.9%。14年跨期时，低收入国家向上转移概率为9.8%，中低、中中、中高收入组向上转移的概率分别为15%、18%和17%。28年跨期时，低收入组向上转移的概率为13%，中低、中中、中高收入组向上转移的概率分别为13.9%、14%和22.6%。由此可见，不论短期还是长期，转移概率并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中等收入国家向上转移的概率始终大于低收入国家向上转移的概率，后一阶段的跨越难度并没有高于前一阶段的难度。

作为一个从低收入向高收入过渡的必经阶段，短期内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随着时间的延长，向上转移的概率逐渐增加。而且，数据结果并没有支持收入转移的难度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的观点。因此，不论是基于均衡陷阱的角度还是转移难度的角度，中等收入陷阱都不存在。

## 五、结论

中等收入有绝对和相对之分，绝对意义上的中等收入是个历史概念。若干年之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会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等收入将会消失，因此绝对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是不存在的。相对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率相对于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要低，历史数据没有显示这样的趋势。相反，发展经济学的工业化理论认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最高，世界各

国驼峰型经济增长趋势支持了这一观点。已有理论和实践无法证明中等收入陷阱存在。本文从陷阱的稳定均衡性质出发，引入统一增长理论，发现中等收入阶段对应着一个非稳态均衡点，不符合“陷阱”的经济学定义。然后计算1950—2008年139个国家的收入转移次数和转移概率矩阵，用数据说明中等收入阶段确实不具备稳定性，低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更稳定，从而逻辑一致地证明中等收入陷阱不存在。同时发现，中等收入国家向上转移的概率并不低于低收入国家，不存在中等收入国家向上转移更难的问题，中等收入国家向上转移的概率随着时间的延长逐渐增大，再次否定“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

虽然“中等收入陷阱”不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中收入阶段的特征没有意义。中等收入阶段作为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向高收入转变的过渡阶段，对一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发展经济学只是研究低收入国家如何起飞问题，至于中等收入阶段如何发展，至今还是空白，因此时代要求我们对发展经济学进行理论创新。但是，研究中收入阶段的规律性特征不一定非要在“中等收入陷阱”的标签下进行。我们建议用“中等收入阶段”代替“中等收入陷阱”更为合适。中等收入国家应该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调整经济发展战略，转换经济发展动力，缩短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的时间。

中国已经进入中高收入阶段，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依靠低收入阶段的发展方式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已经难以为继，因此要根据中国要素禀赋和国内外条件的变化情况加快推进动力机制转换，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效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在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深化各项体制改革，提出相应的对策良方，提升宏观经济发展质量(谭崇台,2014)。但是，探索新阶段的各种问题和提出各种对策思路不要放在“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标题下讨论，以保持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同时也可避免造成中国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错觉。

### 注：

- ①从中国知网搜索可知，以中等收入陷阱作为文章题目的，2007年是13篇，2008年是5篇，2009年是15篇，2010年49篇，2011年猛增到211篇，2012年达到295篇，2013年增加到310篇，截止到2016年10月中旬达到190篇。
- ②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

- ③Garrett(2004)比较发现高收入国家2000年的人均GDP相较于1980年增加了50%,低收入国家提高了150%,而中等收入国家仅提高了20%。Eeckhout & Jovanovic(2007)将1975—2000年154个国家按照人均GDP排列,计算10个国家的移动平均人均GDP增长率,发现收入两端的经济增长率最高,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最低。
- ④214个国家(地区)包括1991年苏联解体产生15个国家,1991—1992年从南斯拉夫共和国独立出来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马其顿,1993年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分解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1993年从埃塞俄比亚宣布独立的厄立特里亚,以及2006年分别独立的塞尔维亚和黑山。其中,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白俄罗斯、俄罗斯、斯洛文尼亚属于中高收入国家,其余14个国家属于中低收入国家,只有厄立特里亚属于为低收入国家,导致1992年中低收入国家组所占比例短暂上升。
- ⑤世界银行214个国家(地区)中,因数据缺失严重,剔除了关岛、列支敦士登、北马里亚纳群岛、圣马丁(法属)、圣马丁(荷属)、圣马力诺、安道尔共和国、库拉索、开曼群岛、摩纳哥、新喀里多尼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格陵兰、法属波利尼西亚、法罗群岛、海峡群岛、特克斯科斯群岛、瑙鲁、索马里、缅甸、美属维尔京群岛、美属萨摩亚、英属维尔京群岛、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根廷、阿鲁巴、马恩岛。
- ⑥Chesnais(1992)提出了三个人口转型标准:(1)预期寿命超过50岁;(2)人口生育率出现显著下降;(3)人口出生率低于30/1000。第一个标准最宽泛,第三个标准最严格,第二个标准介于两者之间。
- ⑦Cervellati & Sunde(2011)认为人口增长率呈现“驼峰型”(hump-shape)的原因在于死亡率下降先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二者之间的延迟使得人口增长率呈现“驼峰型”。
- ⑧具体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参见Vries & Erumban(2015), <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
- ⑨收入分组标准依据源于Felipe et al(2014)。表中包含89个国家(地区)的数据,剔除了缺漏值严重的国家(地区)。
- ⑩14年和28年源于Felipe(2012)认为一均人均收入如果在14年内、28年内不能由中低收入阶段、中高收入阶段向上收敛,就被视为陷入“中低收入陷阱”和“中高收入陷阱”。

### 参考文献:

- 陈昌兵,2009:《“福利赶超”与“增长陷阱”》,《经济评论》第4期。
- 蔡昉,2008:《中国经济如何跨越“低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1期。
- 蔡昉,2011:《“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经济学动态》第12期。
- 杜曙光 刘刚,2013:《“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再发现》,《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第5期。
- 郭金兴 胡佩选 牛牛,2014:《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证据、理论逻辑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经济学动态》第1期。
- 胡鞍钢,2010:《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当代经济》

- 第15期。
- 樊纲,2014:《中等收入陷阱迷思》,《中国流通经济》第5期。
- 刘福垣,2011:《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南风窗》第16期。
- 厉以宁,2012:《论“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动态》第12期。
- 林志帆,2014:《“中等收入陷阱”存在吗?——基于增长收敛模型的识别方法》,《世界经济研究》第11期。
- 郭熙保,2009:《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新解——来自后发优势视角》,《学术月刊》第2期。
- 华生 汲铮,2015:《中等收入陷阱还是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学动态》第7期。
- 江时学,2013:《“中等收入陷阱”:被“扩容”的概念》,《国际问题研究》第2期。
- 姚枝仲,2014:《什么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济评论》第6期。
- 张德荣,2013:《“中等收入陷阱”发生机理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经济研究》第9期。
- 徐康宁,2012:《“中等收入陷阱”:一个值得商榷的概念》,《浙江日报》3月30日。
- 杨斌,2011:《统一增长理论及其应用述评》,《管理世界》第5期。
- 王一鸣,2011:《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中国投资》第4期。
- 范和生 唐惠敏,2015:《“中等收入陷阱”本身就是理论陷阱?》,《人民论坛·学术前沿》第4期。
- 陈晓光 龚六堂,2005:《经济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第2期。
- 郑秉文,2011:《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 谭崇台,2014:《影响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要素——基于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历史考察》,《宏观质量研究》第1期。
- 陶短房,2015:《“中等收入陷阱”的迷思》,《同舟共进》第8期。
- Agénor, P. & O. Canuto(2015), “Middle-income growth traps”, *Research in Economics* 69(4):641—660.
- Aiyar, M. S. et al(2013), “Growth slowdowns and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king Paper, No. 1371.
- Aoki, M. (2012), “The five phas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in China, Japan, and Korea”, in: M. Aoki et al(eds), *Institutions and Compar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Palgrave Macmillan.
- Badiee, S. (2012), “A review of the analytical income classification”, World Bank, <http://blogs.worldbank.org>.
- Barro, R. J. (2016), “Economic growth and convergence: Applied especially to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 w21872.
- Bulman, D. et al(2014), “Transitioning from low-income growth to high-income growth: Is there a middle income trap?”, World



-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7104.
- Cervellati, M. & U. Sunde(2005),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life expectancy,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5):1653—1672.
- Chesnais, J. C. (1992),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Stages Patterns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chevarria, C. (1997), “Changes in sectoral composition associated with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38(2):431—452.
- Eeckhout, J. & B. Jovanovic(2007), “Occupational sorting and development”, NBER Working Paper, No. w13686.
- Eichengreen, B. et al(2011), “Whe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 w16919.
- Eichengreen, B. et al(2014), “Growth slowdowns redux”,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32(11):65—84.
- Flaen, A. et al(2013), “How to avoid middle income traps? Evidence from Malaysia”,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6427.
- Felipe, J. (2012), “Track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What is it, who is in it, and why?”,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of Bard College Working Paper, No. 715.
- Felipe, J. et al(2014), “Middle-income transitions: Trap or myth?”, Asi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 No. 421.
- Galor, O. & D. N. Weil(2000), “Population, technology, and growth: From Malthusian stagnation to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beyo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4):806—828.
- Galor, O. (2005), “From stagnation to growth: Unified growth theory”, in: P. Aghion & S. N. Durlauf (eds),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lsevier.
- Garrett, G. (2004), “Globalization’s missing middle”, *Foreign Affairs* 83(6):84—96.
- Gill, I. S. et al(2007),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 Huang, Y. P. et al(2014),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the middle-income trap: What can China learn from the cross-country experience?”, *China Economic Review* 31:426—440.
- Im, F. G. & D. Rosenblatt(2013), “Middle-income traps: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survey”,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6594.
- Kharas, H. & H. Kohli(2011), “What is the middle income trap, why do countries fall into it, and how can it be avoided?”, *Glob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3(3):281—289.
- Kremer, M. et al(2001), “Searching for prosperity”,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55(1):275—303.
- Ohno, K. (2009), “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Renovating industrial policy formulation in Vietnam”,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26(1):25—43.
- Paus, E. (2012), “Confronting the middle income trap: Insights from small latecomer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47(2):115—138.
- Paus, E. (2014), “Latin America and the middle income trap”, ECLAC,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Series, No. 250.
- Pritchett, L. & L. H. Summers(2014), “Asiaphoria meets regression to the mean”, NBER Working Paper, No. w20573.
- Rigg, J. et al(2014), “Personaliz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An inter-generational migrant view from rural Thailand”, *World Development* 59:184—198.
- Vandenberg, P. et al(2015), “The middle-income transition around the globe: Characteristics of graduation and slowdown”,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519.
- Vries, K. D. & A. A. Erumban(2015), “Total economy database—Sources & methods”, <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
- Woo, W. T. (2011), “Understan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Malaysia”, World Economy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
- Woo, W. T. (2012), “China meets the middle-income trap: The large potholes in the road to catching-up”,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10(4):313—336.
- Ye, L. & P. E. Robertson(2016), “On the existence of a middle-income trap”, *Economic Record* 92(297):173—189.
- Yusuf, S. & K. Nabeshima(2009), “Can Malaysia escape the middle-income trap? A strategy for Penang”,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4971.

(责任编辑:李仁贵)